

文章检索

特别专题

组织机构

专家库

您的位置: [首页](#) >> [论文库](#) >> [青年恋爱、婚姻与家庭研究](#)

心有余而力不足? ——农民工子女教育的选择

作者: 刘成斌 郑志华 | 最后更新: 2007-11-15

【摘要】本研究通过实证调查,分析了农民工对待子女教育的态度。结果显示,农民工对务工所在地的社会环境总体上倾向于积极评价,但是对自身及子女可能受到的文化歧视与社会排斥也相当担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民工子女由留守转为流动。

【关键词】经济成本; 公办与民办; 文化冲突

本研究从农民工关注的经济成本核算、文化冲突与社会排斥、家庭关系等方面,分析其如何看待子女的教育选择,所用调查数据来自笔者于2006年5-7月对浙江义乌问卷调查与访谈相结合的调查。

一、经济成本——选择的第一焦点

从我们的调查结果来看,农民工对子女教育的期望是以“上大学”为主,期望孩子成为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占68.1%,大专的占12.1%,高中及以下的只占19.8%,这表明农民工群体中对子女教育的预期就总体而言还是非常高的,这既有赖于中国重视教育的文化传统,更来自于当前中国社会中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中的城乡差别,尤其是农村孩子出路狭窄,教育仍然是当前农民子女跳龙门的“主干道”。在如此高的教育期望下,农民工又是如何看待教育期望实现的经济成本的呢?

在我们的调查中,针对“孩子带出来”的负面评价中,“费用高”的评价有180人,占样本的75.0%,说明经济成本是农民工思考子女教育问题的“第一理性”。调查中,我们强烈地感受到农民工是穷怕了——苦日子的记忆及现实中沉重的经济压力让他们对于“钱”非常敏感,在处理家庭生活、人际关系、子女教育等问题上,常常考虑的首位因素就是“钱”多少,这种条件反射式的意识,使“费用高”成为远远高于其他选项的“中标”项,相对于城镇居民中的三大忧虑“住房、医疗、教育”的排序,农村人对教育的敏感甚于住房与医疗。换句话说,教育是农民工多元忧虑中的第一焦点。所以,费用问题是农民工选择子女教育问题上的“不能承受之重”。

为了印证调查数据,我们设计了另外一个题目,即“农民工之所以把子女留守家乡的原因是什么”,结果显示,“老家上学便宜”是最高选择项,占到了调查对象的69.6%,而且是远远高于其他选项。那么,农民工把子女带出来到底会增加多少开支呢?这种增加量是不是达到了农民工收入完全不能够承受的地步呢?我们把农民工计算出来的“孩子流动出来增加的费用”与农民工的平均收入水平作一比较。在调查的对象中,农民工年收入的平均数是12036元,中位数是10000元。由此,从农民工收入水平与子

女流动出来增加的费用比较可以看出，流动出来一个子女一年增加费用的平均值是农民工年收入水平平均值的56.5%。换言之，就体现集中趋势的平均值而言，农民工让一个子女流动出来就要把超过一半的收入拿出来“开支”掉。这种流动的成本代价相对于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来说是太高了，于是也就不难理解农民工对经济成本关注的聚焦程度了。

二、公办与民办——教育质量的困惑

在将子女流动出来的农民工当中，63.5%的人解释自己把孩子带出来的好处是“让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此项选择远远高出其他选项。这说明在经济压力不可抗拒的焦虑下，农民工对于子女流动出来与追求子女教育质量进而改变子女命运与前途的关联还是有比较大的积极性。

在将子女流动出来的情况下，农民工面对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学校的选择——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之间做出选择。调查中，选择民办与公办学校时农民工考虑的第一因素为“教学质量”的占40.3%；“教学管理规范性”占29.9%，“费用承受能力”占13.4%，“学校距离远近、方便程度”占16.4%。从中可以看出，单纯地就农民工的第一考虑因素而言，其理性的最高比例集中在“教育质量”上——为了实现子女跳龙门的目地，农民工让子女流动出来的第一重要目标是让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毋庸置疑，公办学校无论是师资力量、学校的地理位置、交通方便程度，还是学校的硬件设施、学习氛围、教学管理等方面，都具有比民办学校明显的优势，但公办学校一般情况下都要比民办学校收费高，而且有各种“门槛性”条件。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清楚地知道，由于客观现实中农民工所处的社会结构决定了其收入水平的低下，由此公办学校的教育优势与经济成本核算压力的冲突与矛盾，成为农民工选择学校时的核心问题。从现有的关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报道及我们的调查中，可以肯定的是教学条件及其质量堪忧，打工子弟学校的开办非常地简单，属于私人办学，缺少合法的办学手续；很多教师没有教育的经验，是半路出家临时操起教鞭的，流动性很大。

在社会媒介与城市普通大众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评价总体上呈现“消极倾向”的形势下，农民工是如何看待农民工子弟学校与家乡学校的比较的呢？我们调查的结果是：认为农民工子弟学校比家乡的学校要好的超过有效样本的三分之一；“差不多一样”的占29%，两项合计占有效样本的三分之二。由此，不难理解那么多的农民工为什么愿意付出他们的血汗钱把子女送到被城镇居民与社会媒介看不上眼、甚至是鄙视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中，中国城乡差别尤其是教育资源的差别再次得到了深刻的体现。

在清楚理解了农民工在子女教育方面的现状评价之后，我们应该了解农民工如何预期其未来若干年内的子女教育决策的——农民工会不会在子女教育选择上有大的变动、现在留守的会不会将来转为流动，现在流动的会不会将来转回家乡，尤其是那些还没有上学的儿童的父母会如何决策。为此我们调查了农民工对其子女教育方面的“将来时”。结果显示，农民工对未来五年内是否流动的预测“不会”的占42.9%，57.1%的调查对象认为他们将会让孩子在流动地上学；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对“老乡们是否会让孩子流动出来”的回答中“大多数人会带出来”占51.6%；“大约一半的人会带出来”占21.0%；预测“只有少数人带出来”占27.4%。

由此，农民工不管是就自身个人情况的预测或是站在老乡的立场预测，未来的若干年内，农民工子女选择流动的比例预计占总体的一半左右——现在流动出来的是三分之一。这说明在未来发展趋势中，虽然农民工受到经济收入水平的限制，虽然农民工把经济成本核算视为第一焦点，但是综合考虑利弊得失，农民工把子女流动出来的人会越来越多。根据2004年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国儿童中心共同立项、财政部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资助的一个调查，我国的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的总量达1982万；周济2006年4月27日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关于普及义务教育和实施素质教育的工作报告中声称的流

动儿童与留守儿童的总量是2840万；我们暂且按照比较保守的数字2000万计算，未来若干年内现有的留守儿童转为流动的数量将为300万以上。这将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就浙江省而言，根据浙江省教育厅公布的数据（参见浙江省教育厅：《我省解决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的有关情况》），2004年浙江省有流动儿童58万，其中正常入学的有56万；本调查发现流动出来的儿童只占农民工子女的32.5%，这与全国农民工子女的流动率相当；如此推断，在浙江省务工的农民工的子女未来数年内由留守向流动转变的规模大约在38万左右。

应该说留守转为流动的增长趋势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种增长趋势的具体幅度有多大，可以在多大的程度上实现，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从现有情况估计，浙江省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选择流动的需求一定会增长，但增长幅度不会过大的理由是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适龄儿童总量若要有大幅度增长，需同时具备以下条件：一是农民工的居住条件足以允许他们带孩子；二是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有较高的稳定性甚至是一定幅度的提高，使他们足以有能力供孩子在城市读书。如果说居住空间条件具有比较大的压缩性的话——农民工常常是一家三至五口人居住在总面积十个平方米左右的房间甚至是棚屋内，除了一张床与必要的做饭工具外，似乎不能放下任何额外的东西。但是，收入水平及收入的稳定性是农民工把子女带出来接受教育的必要条件。

在调查结果中，“如果政府取消农业户口，自认为能够在城市稳定下来的把握成数”在8成以上的只有25.8%；5-7成的24.3%；其余的人都是在5成以下，这说明农民工对于自己未来若干年在城市里稳定下来的预期把握不是很大。所以就总体的预期来看，农民工将留守子女转为流动的过程将是有一定阻力的，其速度不会过于猛烈。

三、文化冲突与社会排斥——流动的焦虑

城乡差别的社会结构背景一再被我们提及，农民工在考虑子女教育问题上除了第一焦点——经济成本外，重点关注的是孩子的成长环境，这里的环境应该说是教育条件之外的社会大环境——比如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子女是否有歧视或蔑视，如果有这些现象，作为父母的农民工如何看待子女所受到的遭遇——虽然自身为了务工而不得不寄人篱下，忍受这种不公，但子女是可以选择的，可以把子女留在家乡而避开这不光荣的一面。所以说，城乡在社会环境上的差别也是农民工考虑子女教育选择上的重点因素。

根据社会化理论，一个人在社会化的成长过程中，会受到家庭、学校、同辈群体、媒介、社会环境等多方面影响，而事实上这些因素都是难以分开的，尤其是社会环境既可包含除家庭以外的各种因素，也可以单独指学校、同辈群体之外的因素，本研究在这里是指包含学校与同辈群体因素在内的社会环境。社会化理论认为，社会环境对儿童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要超过学校教育本身，社会大环境的公平与公正对人的影响越来越受到重视。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社会公正与公平、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等问题近年来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并着手加强落实相关的社会政策，社会公开讨论公平与公正问题也才能充分展开。

调查数据显示，农民工对所在务工地的社会环境的评价，总体上是倾向于积极的，认为务工所在地比家乡好很多或好一点的占总样本量的72%；倾向于否定性评价的不到一成。这说明，农民工对城镇的社会环境是相当向往的——虽然事实上农民工子弟学校不一定比家乡的学校好。但是，在子女教育问题上，让子女在务工地接受教育当然可以受到更好的文化环境的熏陶，而同时也必须面对另外一重困惑与焦虑——文化冲突与社会排斥，这一点在《接纳？排斥？——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的社会空间》一文中有更详细的展现。

刘成斌：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讲师，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郑志华：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团委书记

责任编辑：王珑玲

（原载《中国青年研究》2007年第7期）

[\[返回首页\]](#)[\[关闭窗口\]](#)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中国青少年研究会

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31004号

地址：北京市西三环北路25号 邮编：100089

编辑部：86-10-88422055 电子信箱：louke11@yahoo.com.cn

